

一读政事、二读改制、三读兵戎……

◎ 杨 淼 (著)

历史七读



在古代中国浩瀚的史海中选取的这七捧浪花，
折射的不仅只是历史，更是以史为镜，体现了作者
对当今诸多社会问题的深层思考。

历史七读

◎

杨 森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七读/杨森著.—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1.1
ISBN 978-7-80740-631-0

I . ①读… II . ①杨… III . ①中国—历史—通俗读物
IV . ①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16942号

出 版 人

陈鸣华

责任编辑

崔衡

装帧设计

汤靖

书名

历史七读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网址:www.shwenyi.com

印刷

上海港东印刷厂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8.375

字数

100

版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7-80740-631-0/K·280

定价

28.00 元

告读者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

T: 021-59671164

目 录

前记	1
----------	---

一读：政事

重本抑末	2
独尊儒术	7
外戚干政	12
中庸之道	17
斥“奇技淫巧”	22
“官本位”体制	27
文字狱	32
“天国”覆灭	37

二读：改制

王莽改制	44
武后革命	49
永贞革新	55
熙宁变法	61
百日维新	67

洋务运动	73
------------	----

三读：兵戎

评说李广	80
诸葛之智	86
藩镇之设	92
张巡食人	98
贤奸争胜	104

四读：崇仰

帝陵厚葬	112
唐重佛教	118
会昌灭佛	124
“神拳”种种	130
豪侠崇拜	136

五读：士人

孟尝养士	144
“名士”习气	150
朋党之争	156
隐士矫情	162

“选贤”流弊.....	168
“八股”之害.....	174
明季文人.....	180

六读：吏治

阉人政治.....	188
吏笔如刀.....	194
宋官冗员.....	200
明治贪吏.....	206
酷吏与清官.....	212

七读：风俗

纳妾与旌表.....	220
三寸金莲.....	226
二十四孝.....	232
“三鸟”之崇.....	238
“服食”延年.....	244
皇权情结.....	250



一

读

政事



重本抑末

汉朝的大臣晁错在他的那篇有名的奏章《论贵粟疏》中有一段话，大约是很能代表当时许多人的看法的。文中首先描述农民生活的艰难：“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樵薪，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接着又拿商人的生活来进行对比：“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织蚕，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绂。”结论是：“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按晁错的意思，农民的付出是那样巨大，结果却没有好日子过。而商人们不必辛苦劳作，只须略施小技，便可以活得潇洒自在，事情未免太不公平。长此下去，大家不就都要跑去当商人了么？农人改行流亡，撇下农

活没人干，国家的粮食生产岂不成了问题？所以老先生急急忙忙地提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贵粟。即抬高粮食的地位，一是粟可以用来买得爵位；二是粟可以用来免罪。据说汉文帝是接受了他的意见，下令“入粟拜爵”的。但连下几道诏令，好像最终也没能解决“农民甚苦”的问题。农民还是有流亡的，但逃去的大抵也不是改行当了商人。

其实，晁错的这种把农民和商人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可以说是由来已久的。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农立国的社会，以农为“本”，农业受到格外的重视，应该是很自然的。但奇怪的是，作为整个社会不可或缺的商业，却始终受到打压，得不到本该属于它的合理地位。商业被贬之为“末”，在所谓“四民”“士、农、工、商”的排行中，商人的位置当然也被挤到了末尾。在较早的时候，这种现象似乎还不怎么显著。孔子的弟子子贡便是靠经商起家的，弄到“结驷连骑”，所到之处，国君无不与之分庭抗礼，实在威风得很。后来越国的谋臣范蠡，因为害怕受到勾践的迫害，脱身远引，扁舟浮于江湖，实际是改行经商，最终成了家财巨万的大商人“陶朱公”。秦始皇统一天下，对商人的态度好像也很宽容。当时巴蜀有个叫“寡妇清”的女商人，靠着开发“丹穴”（朱

砂矿)发了大财,“擅其利数世”。秦始皇非但不以为忤,还给她修筑了一座“女怀清台”,以资表彰。据《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直到汉初,商人的活动还一直很活跃。关中一带,秦文、孝、穆公时,“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巴蜀则“地饶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吴越一带,也是“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汉初有名的大商人如四川的卓氏、程郑,南阳的孔氏,东鲁的曹邴氏都以经营冶铁闻名,富至巨万。齐地的刁间“逐鱼盐商贾之利”,财富达数千万。关中的富商大贾,有田氏、栗氏、杜氏等,都有家私巨万。在纪元初期的汉代,工商业就达到如此巨大的规模,真是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情。如果按照正常的轨道发展,中国的封建主义的社会体制也许不至于绵亘到两千年之久吧?然而,“工商众则国贫”的思想终究还是渐渐占了上风。从事商业活动的人被称为“游食之民”,在晁错们的眼里,这些游食者是不会从事生产的,只会取巧赢利。这些人一旦成了气候,就必定要蠹国殃民,败坏了社会的淳朴风气。汉朝统治者打击商人的原因,除了觉得商人们“男不耕耘,女不织蚕,而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显失公平而外,还有一块心病,那便是商人们的“交通王侯”。汉代的王侯们往往都不是

省油的灯，为非作歹是家常便饭，更有怀抱野心、图谋不轨的，若是他们与经济实力雄厚的大商人抱成了团，岂不更要尾大不掉，难以对付？秦时的阳翟大贾吕不韦靠着经济实力，不是连皇帝老子也当上了么？汉高祖曾“徙豪强诸侯于京师”，予以就近监视，也是出于此种考虑。总之一句话，对付他们的办法，只有抑制和打击。这种“重本抑末”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可以说十分深远，几乎成为我国两千年封建社会中始终不变的传统思想。汉朝在打击商人方面可谓不遗余力。政府实行盐铁官营，不让商人在大宗物资的经营上染指。又实行“均输平准”之法，直接控制商品的流通。武帝时的“算缗”、“告缗”，更是规定商人所有财产都必须向国家申报，并按每二千钱纳税百二十钱的高税率征税。商人倘若隐瞒不报，则没收财产，还要被被罚戍边一年。与此同时，对商人的人身侮辱与限制也变本加厉起来。汉朝的法律规定，商人不准担任官职，不准衣丝乘车、佩带兵器。后来有些朝代则规定，商人不得戴金银首饰，穿锦绣衣服。明太祖朱元璋规定，一般农民可以穿着“绸纱绢布”，但家中若有人经商，就禁止穿服，进一步明确了商人的“贱民”地位。直至清朝，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还写到，杭城有位商人景兰江因为爱写诗，

充作“名士”，一边做生意卖头巾一边还在背诵“清明时节雨纷纷”，受到作者的百般嘲笑。似乎作诗是知识分子的专利，商人作诗，必定是“附庸风雅”。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所实行的“重本抑末”、打击并限制商业活动的做法，严重地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虽然到后来，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渐繁荣，人们对商人的看法也在发生转变，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待商业活动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但从长远的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商品经济始终处于被压制、被打击、被轻蔑的地位，只能艰难曲折地在石缝里生长，这无疑是延缓了社会历史的进程。如果说，这种负面影响在以往还不易为人察觉，那么进入封建社会的后期以至步入近代后的中国，当西方列强大踏步地超越了我们这个老大帝国的时候，传统的致命弱点就不能如此清晰地暴露出来，令我们反思追悔了。

独尊儒术

建元元年即公元前140年，汉武帝下诏举荐各地的“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集中到首都，由皇帝亲自策问古今的治国之道。在对策的百余名士人中，来自河北广川的董仲舒上奏了他后来被人们称为“天人三策”的《举贤良对策》。董仲舒是位今文经学大师，专治“春秋公羊传”，在汉景帝时做过一阵博士官，但景帝时期朝廷感兴趣的是“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所以他老先生当时并不得志。这回武帝的异乎寻常的举动使他感到，自己等待已久的机会终于来到了。于是他把多年来精心准备的一整套新奇的学说端了出来。我们都知道，公羊学家的一大特色便是牵强附会、胡编乱造。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的一个主要论点便是：“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也就是说，“天”成了一位有意志、有好恶的人格神，而皇权又是上天所授予的。后世多把董仲舒称为“儒学大师”，把他提出的一套称为“儒术”，实在有些名实不称。孔夫子从来就对

“怪、力、乱、神”表示厌恶，虽然也说过“我所否者，天厌之”、“天丧予”之类的话，但从未把“天”看做一个君临世界的人格神。董仲舒的言论其实只是将战国时期阴阳家们的另类见解拿来做了一些引申发挥而已。“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观念是很早以前就存在的，在殷商卜辞中就经常出现一个“帝”字，它便是一位主宰人世，有意志的天神。周朝的统治者也一样，认为自己是“天”的意志的执行者。“丕显文王，受天有命”，周取代殷，也是遵奉了上天的命令。后来的阴阳家如邹衍等，想象力更加丰富，又在此基础上套用了“五行”相生相克的说法，仿佛所有帝王的生灭次序，是早就由上天安排好了的。董仲舒的发明，只在于将这一切披上了“儒学”的外衣。儒学走上畸变的神秘主义的道路，董仲舒可以说是始作俑者。

当然，在董仲舒的杂烩中，也保留了一些儒家的东西，譬如主张实行“仁政”，“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教庠序以化于邑”。同时又提出“大一统”的观念，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而考虑到“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旨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下不知所守”，因此，最好的办法莫如罢黜百家，

“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摇身一变，俨然把自己打扮成了儒学的正统，孔子的继承人。

尽管当时朝廷中信奉黄老之学的力量仍然很大，但董仲舒的这一套，尤其是君权至高无上而又是受天之命的说法，对刚刚即位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丞相卫绾看出皇帝的心思，立即奏称，“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者，请皆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从此得到确立。应该承认，董仲舒的儒学“大一统”的思想受到武帝的赏识是有其时代的必然性的。黄老无为之学只能适用于汉初那种相对平静的社会状况。申韩的刑名之学被秦始皇用过了头，已普遍遭到人们的厌弃。现在唯一可以拿来充当官方指导思想的就只剩下了儒学。而经过改头换面、重新包装的儒学对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封建统治也确实是为“实用”的一种思想体制。这也是儒家思想在以后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始终被定为一尊的原因。然而，从此以后，战国以来的百家争鸣之局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的思想学术园地，本来是繁花似锦，春光烂漫，充满着生机与活力。但经过秦汉两朝风刀霜剑

的摧残，早已凋零得不成模样了。司马迁曾论六家要旨，对各学派作了较为公正的评断。认为“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不能易也。”墨子虽然主张薄葬，“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将造成“尊卑无别”，但它“强本节用”的做法，则是“人给家足”之道，不无可取。法家严而少恩，不别亲疏，不分贵贱，有断于法，使得“亲亲尊尊之恩绝”，因而可行一时而不可长用。但它的“尊主卑臣，明职分不得相逾越”也是可取的。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但循名责实，参五不失，仍是需要的。道家无为，以虚为本，以因循为用，能究万物之情，可是用它来治天下，恐怕也不易。总之，本来各派都有自己的长短，不可偏废。学术的生命是争鸣和不同观点的交锋，现在采取行政的手段，专重儒术，一枝独秀，排斥不同的学术主张，其实对儒家也未必是件好事。武帝首先设五经博士，以儒生公孙弘为相。至成帝时博士弟子员增至三千人，汉末太学生更是达到三万人。俗谚谓：“黄金满籝，莫如教子一经。”儒学成为一般士人登进仕途的唯一通道。遭受打击的各学派迅速地被边缘化，衰萎下去，从此一蹶不振。有

人说，独尊儒术并未结束争鸣，例如汉末的经今古文之争。要说这样的“争鸣”以后当然还有许多，比方发生在宋明“理学”的各个流派之间的纷争和公案。但所有那些争论，都不过是在儒学“后院”里的争论。说得难听一点，是“螺蛳壳里做道场”而已，哪里谈得上是百家争鸣呢？而且争论的路径也随着思想的禁锢越走越狭，最终演变成了单纯儒家经典字义的孜孜求索罢了。一部学术思想史，几乎成了儒学独家的师承史，思想界的窒息和僵化已经不可避免。而思想的单一与褊狭化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民族精神的蜷曲不伸，失去了它本应有的多样性、丰富性。“独尊儒术”的历史功过，是到了正确评价的时候了。